



新報人 四十周年特刊

編者的話

《新報人》四十周年，一眾編輯及記者製作特刊，回顧四十年來的變化。作為一份學生刊物，《新報人》最珍貴之處，在於沒有政黨的限制、沒有廣告商的壓力，學生可以有較高的自主度製作及出版，這份獨特的自由，值得我們繼續好好珍惜。

在新聞取材方面，《新報人》主張記者自行發掘故題，但在深化報道方面，應以廣闊的視野及深度分析新聞事件。其次，誠如師兄鄭明仁所言，現時《新報人》的報道不夠貼近時事，如何在社會議題發掘新角度，的確值得我們編採人員思考。至於未來發展，要追上時代的步伐，把報道與網絡媒體相配合，相信也是未來《新報人》面對的挑戰。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感激各師兄師姐在每一卷《新報人》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為《新報人》奠下基礎。《新報人》由1970年創刊至今，在版面上不斷革新轉變，多年來跟整個報業與時俱進。本特刊以雜誌形式出版，可說是一個新嘗試，望為即將接任的編採同學開墾一片新土地，在此亦祝願他們改版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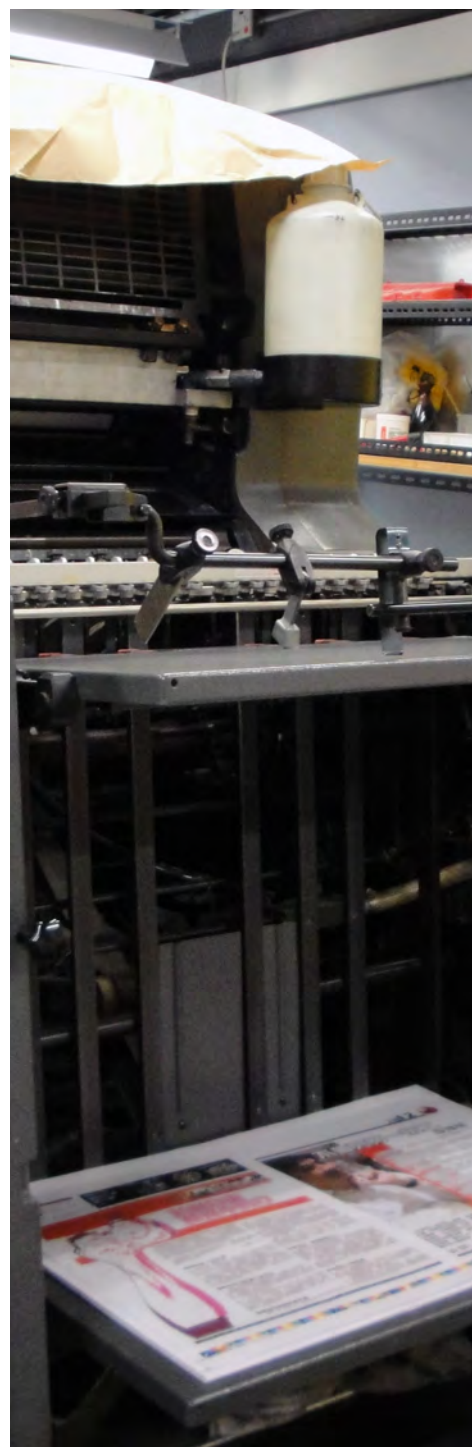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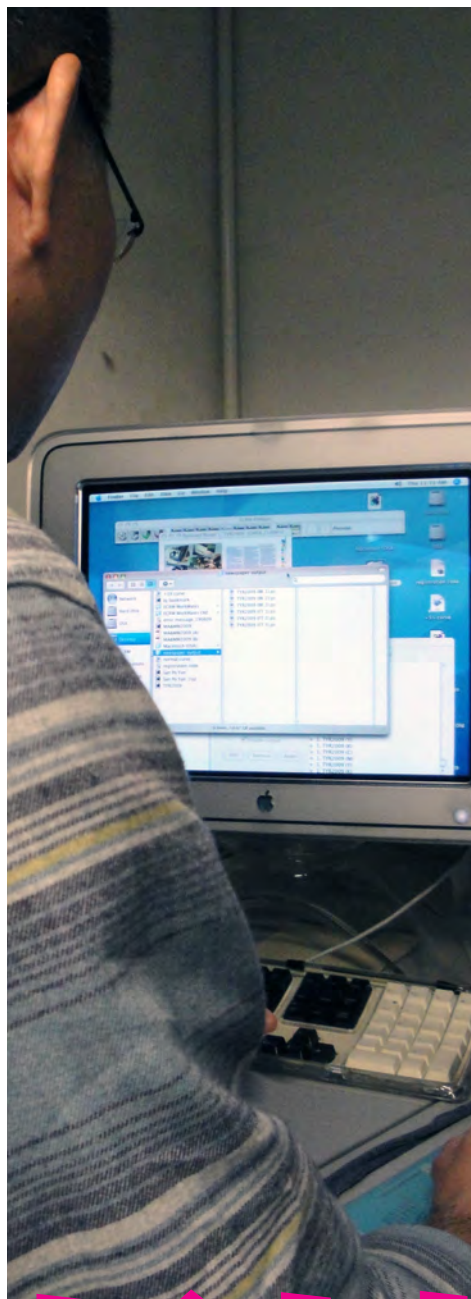
最後我亦非常感謝各編採人員在這一年裡付出的努力，希望往後《新報人》面對新挑戰，仍能越做越出息。

葉芷華

2009至2010年度《新報人》總編輯

目錄

- 頁04 四十年革新 排版演變
- 頁06 版面與故題的進化論
- 頁10 香港鐵路未來規劃 市民角色參與應加強
- 頁12 香港入境政策轉變 中港融合成大趨勢
- 頁13 質素參差 人手短缺 醫護問題四十年未解決
- 頁14 吸毒年輕化 政策需與時並進
- 頁16 屢接無理投訴 廣管局機制疑遭濫用
- 頁18 見證社會變遷 紀錄香港四十年
- 頁20 人物專訪 余也魯
- 頁24 人物專訪 鄭明仁
- 頁26 舊生想當年



新報人 四十華新 排版演變

《新報人》無論是排版、色彩、故題選材等在40年來經歷不少改變，每一改變都是見證著《新報人》的成長。《新報人》40年來都隨著社會步伐而不斷變化：早期的黑白單色；90年代末的雙色印刷；二千年代的彩色頭版，到最新的全彩色印刷，逐步走向時代化。

記者：何穎琪 葉天佑

編輯：張靄敏

《新報人》在1970年創刊，傳理學院創辦人余也魯教授表示，「報人」是四、五十年代稱呼新聞從業員的用語，而「新報人」即代表新晉的新聞工作者，並有實驗創新的意思，是十分適合新聞系實習報紙的性質，故取名《新報人》。《新報人》最初的兩年是年刊出版，期後才增至四期，1973年更發展至一年出版十八期，而發行期數會以實際情況而作出修改，現時《新報人》每年會出版八期。

《新報人》初時是由學生印刷，小至調校油墨，編輯們都要學會。但從1976年開始，學生只需集中精神製作報刊，而印刷工作則交由印刷公司負責。由於當時仍是以人手排版，所以製作人員要先畫出圖文佔版面的面積，定下字體大小後再貼版，即使是一張圖片、一條花邊都要人手貼上，貼歪了就要用刀片將之挖出，重新貼上。

踏入90年代，《新報人》的製作亦開始電腦化，改以電腦排版，報刊於1990年交由學系印刷部承印。於浸會大學工作15年的新聞系技術員梁偉雄(雄哥)表示，由於當時的排版軟件還未完善，所以會有很多出錯，所以印刷前的修補工作相對地較多。

1996年的編輯及記者上任後銳意改革，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全彩色印刷和提高圖表比重等，後來因資源問題而決定改以雙色印刷的折衷方法，令之前只有黑與白的《新報人》多了一絲藍色。自1986年開始任教中文新聞專業的助理教授杜耀明老師表示，當時同學受中文大學《大學線》及報章彩色化的影響，而提出彩色印刷的要求。「隨著《大學線》雜誌化、彩色化，市面上的雜誌多是色彩繽紛，報紙也一樣。這樣的出版環境下，單純的一種顏色感覺很舊，像看黑白電影。」而報頭亦不再使用李維陵的墨寶，改成電腦字體，更加進了一隻單眼火柴人，象徵新一代記者活力朝氣、批判思考及放眼世界的精神。

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在2001年《新報人》首次以彩色印刷。不過有鑑於印刷經費和所需時間的考慮，《新報人》除了首頁與尾頁是彩色外，其餘頁數只能以一版彩色一版黑白色的方法印刷。第三十一卷總編輯高明珠表示，當他們知道能有部分頁數以彩色印刷，他們都會善用彩色的版面，「我們使用那幾頁做圖片故事、特寫等較多圖片的版面。」

《新報人》一直維持了八年，這種彩頁與黑白頁梅花間竹的印刷方法，直至2009年，報紙終於能採用全彩色印刷。第四十卷總編輯葉芷華表示，一彩一黑白的印刷會顯得不統一，第四十卷排版風格改變後，製作的同學認為彩色印刷會更有吸引力。

後來技術員雄哥建議《新報人》改用這種日本製的紙張全彩色印刷。「如果使用普通紙張，效果會不好，因為變化大，不及日本製的紙張穩定。尤其是現在都是彩色印刷，普通紙張會有很多地方印歪了。」雖然成本較高，但雄哥希望以優質的紙張彌補技術上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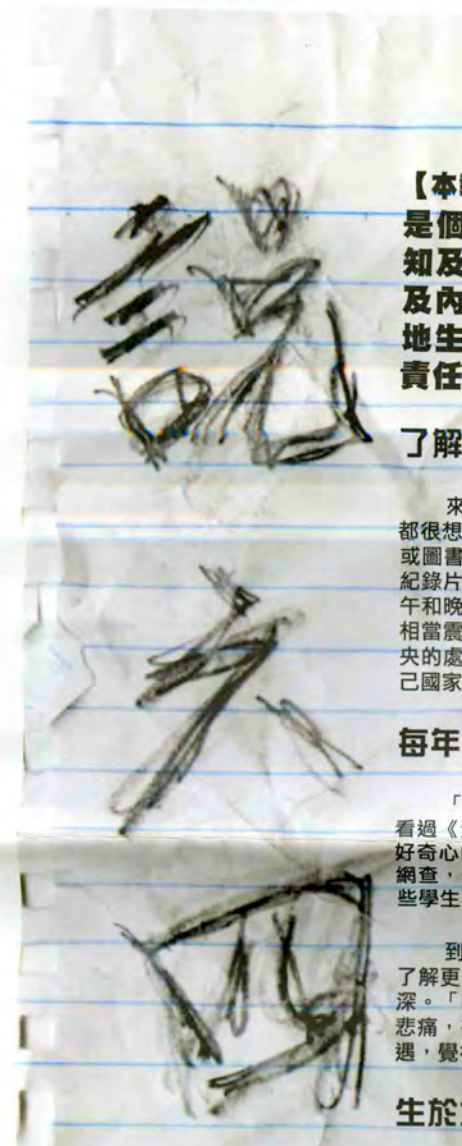
除了色彩外，第四十卷的製作人員也改變了排版的風格。美術總監張傑威認為《新報人》作為一份出版刊物，應該與時並進，「現在很少會見到一份這個尺寸的報紙是直排的，無論是《都市日報》、《AM730》，還是《頭條日報》，全都是橫排和可以放『假頭』(每期內容摘要)。」他表示，如果《新報人》要作直排，對摺後只能看到報頭及製作人員名單。「但如果放了『假頭』，就可以利用內容吸引人。」

張傑威更重新設計了報頭，寓意新舊共融。「有兩個『新』字，一個是毛筆字體，代表以前的事物；一個是較嶄新的字體，代表現在的《新報人》。後面有一個泡泡，象徵你有話要說，你有意見的意思，代表我們《新報人》——浸會大學新聞系的報紙是有話想說給公眾知道。」

「十年人事幾翻新」，四十年來的每一屆編輯上任後，都會為《新報人》帶來一番新景象，務求這份實驗報紙做得更好。張傑威回憶當初希望改革的原因，「當初要變，是因為不忍心看見《新報人》的質素每況愈下。」他也表示至《新報人》改革後，曾多次被其他媒體引述，為所有編採人員帶來不少的成功感。

杜耀明老師表明《新報人》堅守著自治的原則，導師不能完全取代學生的決定。「我們會是一個從旁指引，或指導的角色，主要視乎學生有甚麼想法。每一年都是學生作主導，希望我們如何配合。」他表示會尊重學生的選擇，因為每個決定背後總有原因。「如果要一成不變，我們也會接受，不過我們都會嘮叨。」





版面故事 進化論

【本報訊】40年來，《新報人》的版面設置和報道內容隨時間而改變：從無固定版面到現今以新聞專題、人物、生活等幾個版面為主；記者自行發掘故事題材，亦漸漸取代以往單純報道社會大事件。箇中變化，源自歷屆編輯和記者對探索和創新的堅持。

記者：陳倩瑩 袁樂婷 葉碧涵

編輯：伍甄琪

版面分類 從無到有

從1970年創刊到1983年，這段較早期的《新報人》以關注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重大事件為主，但沒有將各篇報道按照內容進行分類。直至1983年第十四卷第二期，《新報人》進行了大膽嘗試：分為專題、經濟、圖片、文娛、文教五個版面，成為現時《新報人》各個版面的雛形。

1983年後的《新報人》不斷與時俱進，逐年對各版面的名稱和數量進行調整，並且根據內容加入新的版面。「生活」、「閒情」曾作為同一版面的不同名稱；「環保」、「海外」等都曾短暫出現；「北京特輯」、「反日浪潮特稿」等體現出《新報人》對社會大事的強烈關注。現今，《新報人》以主題鮮明的各大版面示人，透露出年輕記者和編輯們對社會某個範疇的關注。

2004至2005年度《新報人》總編輯陳美琪，回憶當年擔任「老總」時，在顧問黃煜老師的提議下增設媒體版，令全份12版的《新報人》中，有二至四版都是談媒體。而陳美琪認為媒體版對學習頗有裨益。「在學校有時是紙上談兵，但透過媒體版，有機會觀察傳媒人做事的過程，亦可向前輩提問。學生擁有最中立的身分，也是最厚面皮的時期，得著的比將來入行後更多。」她又補充，現時大眾接觸的媒體都以平面例如報紙等為多，但媒體版正可以了解其他不同的媒體，如電視、電台等。

自尋故題 收穫艱辛與笑容

翻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報人》，可看到當時標題十分緊貼時事，如「去年電子行業出口增長近八成」、「美堅持保護政策 港紡織業臨困境」。自90年代中期開始，新聞內容變得軟性化：「木偶玩具近絕跡 此情可待成追憶」、「失明青年夢想成真 入讀浸會戴四方帽」。記者自行尋找社會話題，再進行報道，漸漸發展成為一種新模式，其中與學生生活相關的領域更獲得廣泛關注。《新報人》本身理念的改變，使其取材方式發生如此的變化，記者們不斷面臨新的挑戰，編輯們也漸漸地將更多因素納入其選稿的考量範圍。

未來的路

至於《新報人》往後該怎麼走，陳美琪認為，在貼近香港之餘，更應放眼內地，開闊眼界。「兩地融合已成大趨勢，我們有必要了解內地的現況；加上內地之大，有很多人事物皆能成為獨特的題材，比只著眼於香港有趣得多。」她亦提出可嘗試做到印刷版與網上版同步刊登，以得到最多的迴響。

礙於《新報人》出版時距較長，難以如日報般報道最快、最新的資料，她建議《新報人》可從其他角度報道時事新聞，例如：跟進主流媒體的報道，取得更深入、更具體的資料，既可彌補日報的不足，亦可擴大記者與讀者的視野，從更多方面了解事件。

現今 基本固定在新聞專題、人物、生活、攝影、教育、媒體等版面

2000年 開設讀者自由投稿空間，及後欄目數量名稱多變，針對時事發展增設特刊和副刊

1997年 增設傳媒版，探討傳媒現象，將文化和生活版結合，改為閒情版

1996年 增設校園、文化和人物專訪版面

1995年 分為港聞、專題、攝影等多個版面，增設體育版，版面分類開始多樣化

1993年 只餘下要聞、專題、攝影、透視、特寫和人間新話

1988年 增設《透視鏡》，並加入文化生活作為消閒報道

1985年 增設讀者表達意見的園地《縱橫談》

1983年 開始設有專題、經濟、圖片、文教、文娛多個固定版面

1970至83年 除影評專欄（圖片專輯）外無主題版面之分



新聞故事 與時並進

40年來，香港這片土地上
現很多議題不斷重覆，當
地人越來越多、毒品問題
老院情況仍未改善。無論
一一都記錄下來。

四十



經歷了不少變遷，翻閱昔日《新報人》，竟發
中不少更是現今熱話。鐵路不斷發展、來港內
仍然備受關注、電視投訴不減反升、護士及安
社會上的政策是進步，還是退步，《新報人》

蛻變



【本報訊】自1979年地鐵通車以來，香港鐵路的版圖不斷擴展，代表著城市正蓬勃發展。同樣開拓版圖，在2010年1月16日，政府立法會通過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卻有不少群眾激烈反對，令政府與市民演變成敵對的關係。

記者、攝影：李惠 吳美鈴
編輯：黃韻蓓



「菜園村是我的家鄉，所以我要努力捍衛自己的家園。」陳凱珊道。元朗石崗菜園村受政府高鐵路影響，面臨收地拆村。二十多歲的陳凱珊是菜園村的第三代村民，因為要保護家園及質疑選址而反對興建高鐵路。

對於政府興建高鐵路，陳凱珊起初認為，只要保留到菜園村就沒有問題，但後來認為高鐵路並不能服務一般市民。「我認為整個鐵路是建基於不公義，因為興建高鐵路的費用非常昂貴，而建成之後也只是方便商人、旅客等等，政府並沒有詢問市民是否真正有需要。」而且政府的選址和安排都是為了方便商人，漠視市民需要。「菜園村的左邊是石崗軍營，右邊是廢車場，但政府偏偏選中人口最密集的菜園村。」

而且在政府安排的簡介會上，陳凱珊指當時官員只是強調高鐵路的重要性和勸籲村民搬遷。在2008年11月，政府更在沒有諮詢菜園村村民的情況下，入村張貼清拆令。陳凱珊強調，縱使政府已通過高鐵路撥款，菜園村的村民也不會離開菜園村。

過場式諮詢 市民無話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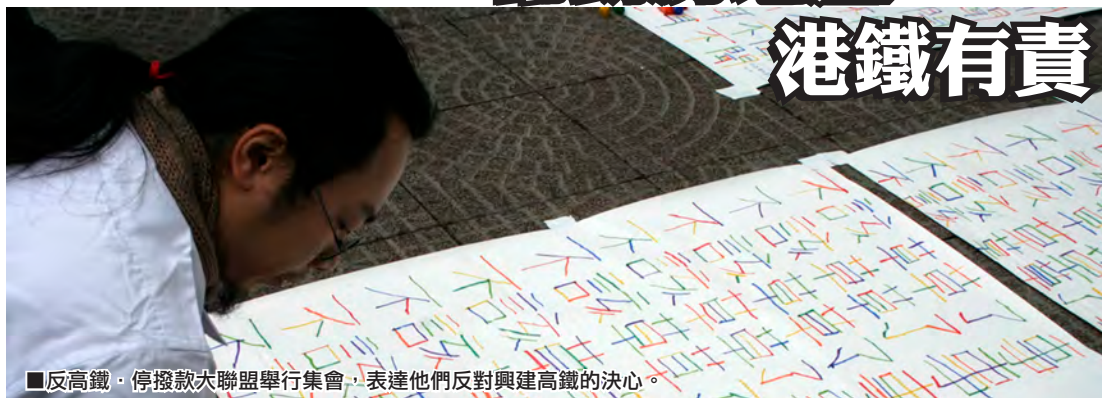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成員陳劍青，認為高鐵路事件反映出香港市民沒有主導權去參與和討論。「自回歸後，很多事件可反映到香港的諮詢架構有很大的問題，天星碼頭、皇后皇后、利東街，以至今日的菜園村，所謂諮詢也只是過場式。」他認為，鐵路有很多種發展模式，而香港的高鐵路，除人民參與度很低外，更是一項破壞家園的計劃。「興建高鐵路的犧牲實在太多，不但菜園村需要清拆，大角咀也會受沉降問題影響。」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也質疑政府的諮詢期長度。「在前幾年的立法會諮詢中，政府從來沒有實際提出數字，這根本難以令人相信他們是做了諮詢。」他更批評興建高鐵路是一項「大白象」項目。所謂「大白象」，指以高昂費用維持，但難有巨大經濟效益的資產。而近年的基建如西部通道、深圳灣橋等，其使用量被高估百分之二十，「特區政府可能要補貼鐵路以維持它的運作，將來可能是一個無底深潭。」

梁國雄議員亦表示興建高鐵路是沒有意思的行為，因為高鐵路的票價太昂貴，一般市民和旅客根本負擔不起。

帶動房地產

港鐵有責？



■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舉行集會，表達他們反對興建高鐵的決心。

前身為地鐵的港鐵公司，提供鐵路服務超過30年。港鐵的營運方針標榜「以客為本」，但近年不少新落成的車站卻遠離民居，而對於一些民間的訴求也得不到鐵路公司的正面回應。九龍南線的柯士甸站，有報章指由於周邊配套不足又遠離民居，令該站使用人流不多。

雖然如此，但香港運輸學會理事熊永達教授認為這是正常現象。「因為港鐵意圖發展新的地區，故鐵路站偏離民居是必然的。」

但陳劍青卻指政府應改變「鐵路帶動房地產」的發展模式。「作為使用者，我們不可以不知道怎樣使用車站，而我們要重新去想一種房地產加鐵路以外新的發展模式。」湯家驊議員亦認為，鐵路作為運輸工具，應該便利香港人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監察港鐵 政府需履大股東責任

湯家驊又批評，特區政府作為擁有75%股權的大股東，卻沒有運用其身份去規管鐵路運作。「市民一直爭取月台增設幕門、殘疾人士乘車優惠等，政府多年來也不肯正視。我看不到香港政府不能做到這點的原因。」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建議，港鐵應該在整體利潤中撥出特定百分比，成立票價穩定機制，並將之變成恆常制度。「政府以土地和注資形式補助港鐵，令其有大額的利潤，我覺得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也不能捍衛市民的利益。」他補充，當鐵路的佔有率越來越大，合理車費應該成為它的首要考慮，已履行社會企業的责任。

當年率道



▲二零零二年■第三十二卷■第五期

「貫通港九 連接生活」

經五年籌備、耗資58億的地下鐵路正式通車，成為市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方便快捷的地鐵亦令其擔當起便利生活的角色，為乘客提供各式各樣的生活資訊之餘，也朝著大力推動環保的方向發展。

▼一九八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
「九龍塘站本年底試辦 地車儲值票可兼乘火車」
乘客可利用地鐵儲值票直接搭乘火車，而毋需購買額外車票，方便市民。

新報

日一月十年三九一 期一第 卷四十第
系學理傳院學會授港香：版出
心中理傳島院學會授道老打窩龍九：址地

開放市場 大眾受惠

業話電港香：題專期本
版二第聞參請

運轉署月底揭標停車場 地車協辦經 爭取車主垂青

（本報記者李惠新報導）香港地鐵公司（港鐵）與運輸署將於本月底揭標停車場，以配合九龍塘站擴建工程。運輸署表示，停車場的興建，將可為九龍塘站擴建工程提供一個理想的停車場，並可為市民提供一個方便的停車地點。運輸署表示，停車場的興建，將可為九龍塘站擴建工程提供一個理想的停車場，並可為市民提供一個方便的停車地點。運輸署表示，停車場的興建，將可為九龍塘站擴建工程提供一個理想的停車場，並可為市民提供一個方便的停車地點。

辦試底年本站塘龍九 火車兼 票可儲地 車乘 票可儲地

九龍塘站將於本年底試辦「地車儲值票」，乘客可利用地鐵儲值票直接搭乘火車，而毋需購買額外車票，方便市民。九龍塘站將於本年底試辦「地車儲值票」，乘客可利用地鐵儲值票直接搭乘火車，而毋需購買額外車票，方便市民。九龍塘站將於本年底試辦「地車儲值票」，乘客可利用地鐵儲值票直接搭乘火車，而毋需購買額外車票，方便市民。



香港入境政策轉變 中港融合成大趨勢

【本報訊】近年香港政府推出了不少便利內地人士來港的措施，如自由行、專才計劃等，以招攬內地不同的專業人士來港，但有學者認為，專才計劃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長遠要融合中港金融業、物流業和知識產權。

記者、攝影：李惠 吳美鈴

編輯：黃韻蓀

個案一：審批制度慢 夫妻長隔兩地

「不能長時間在一起，感情必定受到影響。」楊美貞在1999年申請來港，但等了五年才能與丈夫團聚。簽證問題令她要多次在往返兩地，每次留港的時間也不能多於三個月。因為雙方相隔兩地，楊美貞和丈夫只能靠電話聯絡感情，無法清楚知道對方的情況，就算很信任對方，亦難免會有爭吵。

後來她成功申請來港，但仍需在港居住滿七年才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幸好有姐姐一家在港居住，彼此之間有照應，否則要重新適應環境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個案二：自由行措施 方便內地遊客

從內地來港觀光的陳小姐稱，自由行措施令她可以在一年之間多次來港：「還沒有自由行之前，每次來港都要申請雙程證，十分不便。現在有自由行就可以隨時來玩了。」她表示自己每次來港都會逗留五至六天，並花費約5至6千元人民幣。「在香港購物很有保障，不用擔心會買到假貨。」她亦認為香港除了硬件設施外，軟件設施方面也做得不錯：「香港人大多都很友善，很願意幫助我們。」

個案三：內地生來港求學 政府無資助

每一年均有不少內地學生來港升學，例如香港大學每年會取錄200至250名內地學生，香港科技大學則大約收130人。

就讀計算機科學一年級的內地學生年軻表示，內地學生來港讀書最主要的目的是方便他們將來出國。「香港有較多的出國機會，而且出外國讀書比到香港昂貴一倍。」他又指部分內地學生則是希望將來留港工作，或是希望轉換一個教學環境。

雖然特區政府歡迎內地學生來港讀書，但對他們沒有提供資助。內地學生每年的學費為7萬5千元，比本地學生貴3萬多，加上約5萬元港幣的住宿、生活費，每年要支付港幣10萬元以上。加上他們要唸先修課程（Foundation），再加三年學士課程，四年的費用合共約港幣40萬元數目不少。「雖然政府有提供一些一筆過40萬元的獎學金，但能獲得這獎金的內地學生的成績必須非常突出，所以只有少數人受惠。」年軻說。

但年軻坦言，近年香港的吸引力已經降低。「香港和內地的教育程度並不差得遠，這一年只是浪費我們的學費。」他稱，近年不少內地學生多選擇到外國留學，因為外地的教育制度及其他方面，均比香港完善得多。

調整人口結構 配合中央政策

亞洲研究中心資深博士研究員鄭宏泰指出，香港一直以來是個開放的城市，本身沒有特定的移民政策，而香港在80年代限制內地人士來港的政策，是為了令當時的人口結構分布合理。「現在香港的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人口老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令香港重新開放邊境，讓更多的人來港定居。」

除了應付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同時要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於是推行一連串促進中港合作的措施。

然而，鄭宏泰擔心，面對來自內地的人才，對於沒經歷過大風浪的第四代香港人而言，新的入境政策只會對他們不利。「現時香港的社會比以前來說較穩定，輸入專才可能會引發更大的擠壓效應，把一些較低的階層向下擠。」

人才重疊 勞工市場競爭越烈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巫伯雄，亦批評政府只輸入本地已有的內地人才，令本港勞工階層的競爭更加劇烈。「專才計劃中來港的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一群，現時的失業率甚高，計劃只會令勞工階層競爭更劇烈，造成社會不安。」他建議政府輸入一些香港缺乏的人才，必要時更可以考慮把專才計劃的要求降低。

至於引入內地專才會否成為長遠政策，鄭宏泰認為此舉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短期方法，長遠來說，政府要開放高等教育，培訓更多的人才，使香港成為一個地區性的教育中心。

當年報道



▲二零零二年■第三十二卷■第七期

「內地審批單程證透明度低 港區人大促政府爭審批權」是次報道指出單程證的審批制度由於是由內地的公安局負責，故香港的入境處並沒有權力過問審批事宜。正因如此，不少社會人士指出香港政府應爭取審批權，建立更完善的審批機制。

▼二零零二年■第三十二卷■第五期

「大陸旅客絡繹來港 旅遊業人士：勿過份依賴」是次報道指出香港在2001年的入境旅客在經濟低迷之下仍有增長，而內地更在零二年初取消旅客來港限額，但業界人士卻認為港人不應期望太高，因為內地的市場不是想像般龐大。



質素參差 人手短缺 醫護問題四十年未解決

四十



【本報訊】40年來《新報人》報道過不少民生議題，但仍有些問題一直存在，未見解決。當中安老院服務質素參差，及公營醫療機構護士短缺之問題，正是兩個明顯的例子。

記者：陳梓健 歐陽澄

編輯：黃韻蓓

在1985年，《新報人》曾經報道當時私營老人院良莠不齊的情況，早前本港發生護理人員逼長者吃糞便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安老院的服務質素。

發牌、監管機制不進反退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指，安老院的數目隨時代增加，但普遍服務質素卻未有顯著提升。他表示，在港英政府時期，當局會透過諮詢與公眾溝通，但香港回歸後，發牌及監管機制不進反退。負責監管安老院的社會福利署，雖然網上有公開安老院舍名字或作出檢控有關的安老院資料，但它們會不定期被刪除，令公眾難以取得正確安老院資料，透明度極為不足。

本港長期護理服務的問題多，但政府的監察制度亦未具阻嚇性。例如在2006年，多間安老院舍發生派錯藥事件；2007年，有安老院被投訴虐待院友、管理不善等12宗罪，但兩者社署只發出警告信了事。《安老院條例》自1994年制定以來，從未有安老院因服務差劣遭吊銷牌照，張超雄批評此舉無法起阻嚇作用，「有嚴重事故發生，也只有有形無實的『公開譴責』三數句，有關部門鮮有跟進。」

除監管機制效用不高，護理員發牌制度的漏洞亦導致質素每況越下。善衡專業護理院院長吳小涓指出，現時的護理員發牌制為一次性，但員工有可能因技術生疏和跟不上現時水準，令護理員需要再培訓。她建議可以定期為護理員提供訓練課程，或進行考核，鼓勵他們不斷學習，確保服務追得上應有水平。

人力資源錯配 公立醫院缺護士

除安老院質素問題未解決外，護士人手短缺問題亦由以前發生在私營醫療機構，轉換到公營身上。由於公立醫院沒有人手比例的基準限制，聘用護士時無據可依。加上市場需求遠比畢業生數量更大，護士工作量自然更多，這不但加大了壓力，令士氣低落，更拖垮服務質素。

現時醫生、護士等醫療專職人員的大學學位數量，是根據政府按現時業界需求而預算，衛生服務界的立法會議員李國麟指出，政府為節省開支，以「人手足夠」為理由，減少受訓練人數，現時護士與病人國際慣常比例為1:4至6，但在香港卻達至1:10至12，人手比例達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他又稱，護士的訓練期達四年，當某年培訓減少，服務供不應求的問題就會在數年後浮現。

面對私營醫院的挖角和內地市民求診數字急增，令公立醫院的人手更見緊拙。近年來，越來越多私營醫療機構擴展業務，他們多從公立醫院吸納人手。李國麟指，「它們既有較嚴

謹的人手編排，加上條件較好，比如說會有花紅，往往吸引不少公營機構的僱員『跳槽』。」理大護理學院院長彭美慈亦指出，現時內地人來港的限制變得寬鬆，加上本港醫療設施遠比內地完善，近年來吸引大量內地人會來港接受醫療服務，最明顯的例子是內地孕婦到港產子的數量增加，這增加護士人力的壓力。

維持人手數量 確保供求相應

要維持公立醫院的人力資源供應，需要實施短期及長遠的策略。李國麟建議短期內應著重於挽留人手，例如加開職位，變相增加晉升及加薪機會，希望以較佳的報酬避免人才流失；長遠而言，則依靠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規劃，加上訂立護士病人比例基準作依據，確保護士有穩定的供應。兩者雙管齊下，才能慢慢根治人力資源不足的弊病。

李國麟又表示，對於護士短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對醫療服務的態度，會否願意加大醫療開支。彭美慈質疑，「到底（政府）應該只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還是給予市民最優質的服務？」她補充，政府可透過增加社區保健服務，或培養市民運用公營醫療服務的正确態度等方法，以紓緩市民對公營醫療機構的倚賴。

當年報道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期
「護士人手短缺 亟需開班培訓
以減少挖角現象」
護士人手不足、急需培訓之現象，在二十多年前亦已存在。惟當時問題出現在私院，反過來是政府醫院挖角，跟現在恰好相反。

▼一九八五年
第十五卷第八期
「私營老人院良莠不齊
擬設同業聯會
諮詢社聯意見」

早在八十年代，業界便有意透過設立聯會，增加同業間競爭性，並起監察作用。可見安老院質素問題，在當時已備受關注。



蛻變



吸毒年輕化 政策需與時並進

【本報訊】《新報人》自1979年開始報道過不少有關禁毒題材的新聞，本港吸毒問題一直存在，但對於吸毒的問題、解決政策、戒毒者的需求、吸毒者的年齡及毒品的種類，都有所轉變。隨著吸毒問題的轉變，政府所制定的禁毒政策亦有所不同，從過去的嚴打政策轉變成現今的「減害取向」。

記者：張聲慧 朱嘉儀

編輯：林子斌

減害取向則強調吸毒者個人應如何降低對毒品的依賴性，借助教育及宣傳傳遞濫用藥物的危險性。社會工作學者邵家臻指出，香港是以減少毒品的需求為主軸，政府把用藥的問題放到個人身上，因此推行一些個人化的政策，如校園驗毒計劃。

校園驗毒 漠視師生關係

邵家臻認為，驗毒是不能戒毒的，即使學生被驗出身體有毒，亦不代表他們一定會戒毒。「整件事以阻嚇成份為主，而非戒毒，為的是阻嚇未有吸食毒品的學生。若政策是為了阻嚇學生而建立，那是最懶的方法。」

他批評驗毒是完全抽離社會背景的做法，吸毒者通常是不想面對現實而吸毒。「政府未能解決現實問題，亦未有關心吸毒者的處境，這是一種倒退的做法。」曾吸食毒品達五年之久的李銘揚亦認為，校園個人驗毒計劃並不管用的。「驗毒計劃並不講求關係，而是程序。」他表示，若在過程當中有關係的建立，學生感到被關心，根本不需透過驗毒而承認自己有吸食毒品的習慣，而會自願承認。

但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麟表示，校園驗毒計劃的好處在於能讓學生有所警惕，令學生知道吸毒是不好的。

「計劃就好像雞毛掃的作用一樣，父母把雞毛放在孩子身旁，雖然並沒有打下去，但對孩子會有阻嚇和警惕作用。」計劃的目的並不是要強迫學生驗毒或戒毒，而是要把雞毛掃放在學生身邊，警惕他們不要吸毒，強化吸毒是不好的觀念。

吸毒成青少年次文化

吸毒問題近年趨向年輕化，青少年吸毒人數續上

升。2005至2007年累積青少年吸毒人數上升三成四，2008年首三季亦已上升一成八。連續四年，21歲以下的青少年的吸毒數字大約由16%升至24%。

隨著社會環境和時代的轉變，年青人吸毒的原因亦有所不同。社會工作學者邵家臻指出，以前年青人吸毒可能是因為感到空虛、想逃避、玩不起主流的遊戲、讀書不成、找不到工作等；現今則可能是基於他們對社會的不滿，而逼使他們選擇另一種生活模式。

「我們很難將這些東西糾正過來，可以做的是只能令他們對社會的參與感和投入感更多，拉近社會與他們之間的關係，但這些都是水靜流深的工程，不是立即見到果效的。」

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則表示，現今的大部份家庭多數只有一個孩子，青少年在家中缺乏互動，不像以前的大家庭模式，再加上社會的鄰舍關係有變，物質令人疏離，大家不會有太多溝通。「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缺乏與人相處的機會，以致在自我價值或運用時間等方面都會出現問題，踏上吸食毒品的道路。」

陳兆焯稱，在教育方面，學校的課程、模式以及環境都令學生對讀書大減興趣。「香港的大學入學率只有18%，沒有機會讀書年青人可以做甚麼呢？香港的教育制度製造了很多『失敗者』，年青人容易感到自己沒用。」

現今年青人吸食毒品的種類亦有轉變，以往大多吸食白粉等毒品，現今則轉向吸食K仔、搖頭丸等毒品。陳兆焯認為，吸毒已經變成年青人的一種次文化。「當引入一種新毒品，身邊的朋友都一同吸食時，便會形成一種新文化。校園吸毒也是受文化影響，當大家都開始在課室裡吸毒時，這種文化也就形成了。」因此問題並不在物質之上，而是文化的轉變。

需更多戒毒學校

《新報人》過往有關青少年禁毒的報道，多是提出青少年人需要專門的戒毒服務，或注重討論戒毒所成效等問題。如1995年標題為「青年吸毒日趨嚴重 極需專門戒毒服務」的文章，當中有學者呼籲政府應正視吸毒問題，並儘快設立青少年戒毒中心。1993年1月標題為「戒毒所此鄰成罪惡溫床 療毒計劃成效備受質疑」一文中，則分析美沙酮戒毒所的成果。

隨著吸毒年輕化的趨勢，香港對戒毒所的需求亦有所轉變。陳兆焯指，現時年青人並不是需要戒毒所，而是戒毒學校。戒毒所提倡分離、隔離，而戒毒學校則提倡重投社會，透過教育、學習、讀書裝備他們，豐富他們的社會資本和學歷。

「教育製造了一個平台，讓戒毒的青少年可以長時間去改變人生，接受輔導。在學習期間豐富他們的社會資本，如技能、經驗、學歷、讀書成績以及人際關係，這些東西都不能在戒毒所得到。」

陳兆焯表示戒毒者在戒毒學校裡與其他同齡的學生一樣，以學生身份生活，如同到了一所寄宿學校。學生在戒毒學校裡學習，得到一定程度的學歷，如中五會考程度，畢業後的出路亦更廣。

陳兆焯批評現時全亞洲只有一間戒毒學校，而政府的政策並沒有興建戒毒學校，而且是（私人興建戒毒學校）完全沒有政府資助。

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麟則指，現時的戒毒所有提供教育給戒毒人士。曾吸食毒品達五年的李銘揚表示，在戒毒所只會學習簡單的中英數，以及負責種菜、種花、裝修或廚房工作等。「若當初在戒毒學校接受戒毒，相信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幫助，出路也許會較好，但對於生命改變的成效則不肯定。」

「隔離」政策已過時

根據《新報人》1995年4月，名為「港府堅持不涉傳教 福音戒毒難獲資助」的報道中，有受訪者質疑福音戒毒以長達數年的時間，協助戒毒者戒毒，會否導致戒毒者與世隔絕。

陳兆焯指出，隔離已是一種很古老的戒毒方式，社會不應再以這麼一種方式對待戒毒者，應提倡以「取代」的方式幫助青少年人戒毒，例如以讀書、參加學界比賽，參加渣打馬拉松等活動取代毒品。目的是要讓學生在戒毒的過程中，與社會保持聯繫，而非把學生隔離，不讓他們接觸社會。「學生在正生書院亦有幾年的時候，但他們也不會與世隔絕，反而是重投社會。」

李銘揚則表示，在戒毒所的第一年是以「隔離」的形式生活，直到第二年才多了接觸社會。他在戒毒所時曾「偷走」，因而再次接觸毒品。「短暫的隔離對我而言是好的，因最初入戒毒所時，我的戒毒的決心都不是太強。隔離可以避免我受外界的影響和引誘而再次接觸毒品。」

當年報道



▲一九七八年■第八卷■第十二期
「小量毒品賣家猖獗 利用油漆帶貨上岸」



▲一九九五年■第二十五卷■第六期
「港府堅持不涉傳教 福音戒毒難獲資助」

▼一九九三年■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戒毒所此鄰成罪惡溫床 療毒計劃成效備受質疑」





電視節目投訴狂飆升 濫用機制成疑

【本報訊】80年代，《新報人》以專題形式報道當年商營電視台的「成人節目」製作，及討論影視處對於該類節目的電檢尺度，內容包括當時如何界定「成人節目」，以及影視處對節目投訴的處理機制。時至今日，無論廣播節目出現錯字、涉及暴力或色情成份，市民都可以向廣管局作出投訴。近年廣管局的投訴數字有上升趨勢，有市民認為觀眾濫用投訴機制，令它成為人身攻擊的工具，但亦有電視節目製作人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的體現，可以聽取不同意見。

記者：歐陽文倩 黃昱

編輯：黃保玉

觀眾是電視廣播內容的接收者，也是電視廣播內容的監察人。合理的投訴固然有助改善廣播節目內容的質素，但是本港也曾出現一些被裁為理據不足的投訴浪潮。當中最深入民心的是，在2005年藝人鄭欣宜在某電視節目扮白雪公主，廣管局共收到363宗投訴，而09年藝人鍾欣桐在《志雲飯局》的訪問收到679宗投訴。

投訴多 或濫用機制

根據廣管局2007至2008年的紀錄，電視廣播內容的投訴數字上升了144%，共6184宗投訴，但當中成立的投訴只有220宗。

投訴數字急升，反映觀眾對節目起了監察的作用，但往往投訴成立個案數字卻偏低。廣管局表示，市民有權對廣播節目所播出的一切內容提出投訴，轄下的影視處會就此投訴進行調查及處理，該局只會去分辨那些投訴是否屬於其管轄範圍，並不會對觀眾有否濫用機制作出批評。

對於不少節目投訴內容，有市民認為其投訴理據古怪，有關當局不需要浪費資源處理牽涉個人意願或喜好的投訴，如鄭欣宜扮白雪公主。市民黃先生認為，這些投訴並不合理，那些投訴人也是不負責任。「這些人是濫用了投訴機制，這種不

合理的投訴會對藝人造成傷害，是十分不成熟的行為。」

有人認為投訴數字上升，可能跟廣播節目內容質素下降有關，前無線電視資深編劇李茜則反駁，雖然不同的電視節目在質素上有參差，但這只是創意問題，反觀現時的電視節目在燈光、佈景等方面，比起以往都有很大的進步。

她又表示，已經習慣了一些不合理的投訴，認為投訴最後都會被裁為理據不足，影響是很輕微的。「有意見是好，市民可以透過機制有效地自由去表達意見，這是一件好事，至於成不成立、對不對，則由有關部門判斷及審理。」

廣管局反映社會轉變

投訴數字特別多的個案，通常都與藝人明星有關，但早前紀錄片《活著》，播出非洲土著沒有穿衣服的情景，共收到兩宗投訴，指節目意識不良。監製鄧婉媚雖然不認同投訴的內容，但表示對於一個有百萬多名觀眾觀看的節目而言，只有兩宗投訴，已經反映出香港人有進步。

她又表示觀眾投訴節目的理由層出不窮，但不能因為有人濫用了投訴機制，就否定整套制度。「在製作《活著》的時候，我也有考慮觀眾可能會投訴，但我認為一套紀錄片就是要捕捉真相，真實地表現當地生活、民風，只要表達手法方面沒



一九八八年■第十八卷■第六期

- 《電視臺加強成人節目內容，影視處謂監察工作已經足夠》
- 《色情節目難審定，製作人應有道德》
- 《節目不符合標準，當局讓電視臺解釋》



鍾欣桐(阿嬌)昨午借用老闆樓受成的淡水灣大宅接受《壹周刊》訪問錄影，全城焦點又由張柏芝走到阿嬌身上，不少網民、傳媒都以「博同情」作重點，還提醒大家一年前阿嬌亦有類似打同情牌的舉動。

■藝人鍾欣桐接受電視台訪問，在新聞報道中播出訪問內容，惹來網民抨擊，廣管局接獲市民投訴。

有去渲染裸露，應該是沒有問題。」

她又認為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感受的權利，至於那些不成立的投訴，其實也反映了大眾當時的感受以及大眾的熱心。「對電視製作人來說，多聽一些意見是好的。」

前電視台節目部電視條例及守則科高級經理的胡志倫，在廣管局成立前已經入行，在電視台負責監察節目。對於現今社會的投訴風氣，他認為現在有很多古怪、無聊的投訴，例如跳水節目，運動員有沒有穿上衣也成為投訴內容之一。除此之外，更有團體發起一人一信的行動，透過廣管局作出投訴。

然而，他卻表示這只是部份市民的意見，但並不等於投訴會成立。他又認為廣管局能夠有效反映社會的轉變。「例如在1997年回歸後，廣管局的裁決相對顯得保守；2003年沙士期間，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廣管局開始允許電視節目中可以有贊助商的商品出現」。胡志倫認為，廣管局的標準是要跟著社會而作出調整，電視台製作節目時也要符合大眾的需要，在盈利和觀眾利益之間要找到平衡。

李茜表示，廣管局的條例很多時候都是要符合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往電視劇中不能出現離婚或家庭破碎等

情節，現在都可以了，在對白方面也比較開放了。」

投訴機制有改善之處

廣管局現行的投訴機制規定，對於投訴裁決不滿的市民可以上訴，個案將會交由投訴委員會處理，當投訴委員會裁定投訴成立時，廣管局會要求電視台在四個工作天內提出新的解釋，並規定不可以再搬出舊的解釋作答辯，最後廣管局會考慮投訴委員會的建議以及電視台的新解釋去作最後判決。

胡志倫認為，這套機制中雖然以兩組人(投訴委員會及廣管局)去擔任不同角色，架構看似獨立公平，但執行的時候卻有不合理的地方。

「廣管局在作出最後判決時，其實都先假定了投訴委員會的建議是對的，而不會再去翻看以往的資料，電視台又不可以再以之前的解釋去作答辯，這對電視台並不公平。」他認為投訴委員會也應該有一套審查制度，這樣才更能保證判決的合理性。



▼ 從歷代《新報人》體壇發展。1982年，因此通常會與市政府把建成的場地與映香港體壇的着眼點。



租金昂貴 經濟困難 幼稚園倒閉者日多

【本報訊】香港幼稚園數量減少，原因是出生率偏低、人口老化，但早於80年代，這個問題早已存在，不同的是當時因為當時租金高昂，導致很多幼稚園因經營困難而紛紛倒閉。

據悉，香港幼稚園數量減少，主要是因為出生率偏低和人口老化。在80年代，由於租金高昂，許多幼稚園面臨經營困難，最終選擇倒閉。這一問題在當時就已經存在，但由於當時的經濟環境和社會背景不同，其表現形式和影響程度有所差異。

▲近年幼稚園數量減少，原因是出生率偏低、人口老化，但早於80年代，這個問題早已存在，不同的是當時因為當時租金高昂，導致很多幼稚園因經營困難而紛紛倒閉。

同樣在80年代，電車曾因速度緩慢而被指阻礙交通發展，而被討論應否繼續保留；29年後，電車仍然穿梭於繁華的港島區外，更成為香港的文化象徵之一，滿載不少香港人的回憶。《新報人》於1997年就曾與讀者分享電車與社區的緊密聯繫，以及當中的情懷。

攝影：楊維芳、劉學輝、記者：倪清江

見證社會變遷紀錄

【本報訊】《新報人》自創刊至今努力不懈四十年，在數十年光景中，本年所累積下來的字海，便能喜閱歷年同類報道中，所細說着的時代變遷。編輯的一筆一墨，都紀錄了香港發展的重要里程。

記者：林綺琪 謝思明

編輯：李嘉麗



雀仔街有少許商店舖面經營雀仔買賣

戰前蓬勃一時·戰後變遷面目全非 雀仔街名實不符

當局計劃擴闊路面已收回部份樓宇

差不多具有七十年歷史，在戰前以經營雀仔出名的雀仔街（正名關麟街），當局計劃予以擴闊。因此在大華國貨公司對面的一列舊樓被政府收回。現時，該街已有兩個單位被收購，如要重新興建樓宇，必須俟附在鄰近擴闊路面界限內。拆遷遷移，政府將會給予金錢方面的賠償。不過，由於戰前流行賽雀，七十年代有幾人土為然，以早鳥賽時必帶手推籠籠，直和午後，此風不再流行，所以雀仔業亦隨之衰落。現時這條街已名不虛傳，比鳥籠名罷了。

現時有一、兩家雀店在這條街的舊樓內，應叫作文街，可能無法租到這街的店舖。在雀仔業興旺時，時有門雀觀看，雀仔店在晚上七時不再營業，其他店舖則延至晚上十時多。

雀仔的來源是中國人帶入，以春夏之間雀季最旺，雀仔街各各樓店舖林立，亦有售賣各種日用品的街邊雜貨舖。

這等舊樓存在是已有相當歷史。以前該街店舖因有現營業而向政府提出投訴，當局亦曾派員前來查察，不過至今仍未有採取任何行動。

這條街數十年如一日，都與興旺，戰後雀仔店已漸消失，昔日舊樓已不復見，其他行業相繼遷入。吳氏認為



史坦納

STEINER

PIANOS

史坦納

鋼琴

▼ 在1982年及1996年，雖然相隔了14年，《新報人》亦以雀仔街為新聞題材，惟不同的是1982年報道的是灣仔大王西街，而1996年報道的則是旺角康樂街，報導內容雖然有異，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兩個故事窺探香港人養雀賽鳥的情況。

例如在80年代，年輕一輩較少有養飼雀鳥的習慣；在90年代，他們卻對養鳥樂此不疲，經常到這裡來賞雀購物，養鳥不再是街邊老伯的專利。

人+籠+鳥=？ 繁囂城中的樂園——雀仔街



雀仔街
BIRD STREET



街市裏有千多隻的雀鳥初學者，李氏為籠，雀鳥初學者，初到時，只容得下一兩隻多小時就應已滿堂雀鳥。小雀一見到鳥兒便表現得活潑，他們老眼望孫在籠內飛舞地望著，雀鳥一見到李氏雀籠便交父母傳授經驗：「買鳥真係，」李氏雀籠不虛。



香港四十年

報見證及紀錄香港曾經的高低起伏及萬千變化。深探40種種的社會變化，《新報人》都一一見證，歷屆記者及

四十
蛻變



開山祖師余也魯 細談《新報人》

「當好教授不容易，既要嚴
《新報人》得了多位有心有力的教授的培
理系的開山鼻祖，見證《新報人》的成長與

記者：倪敏燕

編輯：林子斌

四十

蛻變

「格，也要具有愛心。」

育下，茁壯成長。余也魯教授作為傳
與發展。

「新報人是怎樣誕生的」

余也魯



余教授坦言成立學生實驗報紙《新報人》的主要原因是讓學生親身體驗辦報——採訪、編輯、印刷、發行的整個過程。實驗報紙，對四十年前而言，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概念。同學們能透過《新報人》發表其寫作，實踐記者的職責，自然感到高興。《新報人》是全港首份學生實驗報紙，學生對此無什麼經驗，由導師指導下，讓他們慢慢實踐，漸漸達至自我操辦。余教授憶道，學生初期欠缺勇氣，在他強迫下才敢嘗試，一次、兩次的成功為他們打下強心針。

現時《新報人》沒有使用傳統的標誌，但早在創刊時就曾有一個題字。余教授表示，標誌出自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顧問李維陵畫家手筆。至於《新報人》的命名，余教授指出，由於70年代香港傳播進入新時代，新聞再不只是新聞，慢慢發展成為傳播。他認為，以《新報人》為名，所蘊含的意義比「The Young Reporter」更廣。當時，新聞工作者，不論負責發行、採訪、編輯，均被冠以「報人」的稱號。傳理系培育新的人才，投身報業，當個新報人，代表本系的實驗報紙自然稱為《新報人》。《新報人》在1970年正式發行，然而，首兩卷的《新報人》經已散失，無法得知總編輯的名字。有紀錄下的第一位總編輯是莫兆光，他憶述首兩年仍然是實驗性質，沒有分清架構，所以沒有正式的總編輯。1973年，《新報人》以報館形式運作的架構誕生，四年級為編輯，三年級任記者，一年級負責發行。由編輯舉行編會擬訂「故題」，再分派予記者採訪。

第三卷的《新報人》由修讀編輯學的同学輪流任總編輯。

由莫兆光執掌的第四卷《新報人》，一星期一期，全年共十八期。同學們團結一心，十八期均準時出版，沒有記者、編輯「甩稿」。由於四年級同學已進行實習，部分編輯同學均加入報館任兼職，對三年級同學自然嚴格，也對《新報人》故事要求高，因此很多報刊都轉載或跟進《新報人》的報道。「這是我人生的小高潮。」莫兆光至今仍將當年《新報人》妥善保存，《新報人》對他而言，別具意義。《新報人》採訪了不少調查新聞，但未有遇到任何阻滯，編輯和記者們也享有高度自由的發揮。余教授表示，即使沒有人投訴，他們均會就每期內容進行檢討，以提升《新報人》的質素。

「新聞訓練相比廣告、電影更重要。」余教授指出，不少主修公關、電影的學生均有參與製作《新報人》。他認為，修讀新聞能訓練判斷力，應作為基礎訓練。修讀新聞，實踐新聞寫作絕不可缺。「寫才知道是否真正了解；寫才能把事實寫出來。」莫兆光也表示，當年有不少修讀公關、電影的同學在撰寫《新報人》表現出色。他們更為《新報人》爭取到不少廣告，使報刊曾有一段時間能達到收支平衡。



□ 余也魯教授已年過九十，在憶述四十年前的創系經歷，坦言擔心記憶混淆。



■ 創刊初期的《新報人》這本由有紀錄的首位總編輯莫兆光妥善保存至今，足見他對《新報人》的情義結。他笑言，為了安全，更將《新報人》存於家中保險箱。

以無私精神 奉獻傳播事業

余教授在《傳理十年》寫到，其主要興趣是出版事業，海天書樓是他主要的事奉工場。余教授看到未來傳播發展，有需要培育傳播人才。為此，他毅然放棄其熱衷的出版事業。初任系主任，學校資源不多，政府也沒有資助，他連辦公室也沒有。薪水少，付出多，余教授更將首月薪水捐出用以購買兩台打字機供學生使用。他的堅持是受基督精神影響，希望能改變人，捨己為人，維護公義。

在余教授帶領下，傳理系規模日大，得力於林子豐博士（當時浸會書院校長），他將銀行裡的股票賣掉，將錢用作興建兩層高的樓房。上層用作編輯室，下層是印刷房和沖曬房。這不單是建成《新報人》的創作基地，師生的友好關係也從中建立。余教授認為好老師是嚴格，但富有愛心。因此，他請來任教的導師，不少是經驗豐富的報業高層，如：黃應士教授、張國興教授……他們都具有這種特質。這種愛，連繫了他們四十載。

師生雜憶人情在

「我們排版到深夜十一時，完結後老師（潘一工，當時《新報人》顧問）便請我們去吃宵夜。當時，窩打老道中間有條小河，旁邊是兩條大直路，師生們便沿著直路比賽快跑。」莫兆

光雀躍地分享《新報人》的青春歲月。師生關係深厚，至今他仍不時與余也魯教授、黃應士教授聯絡相聚。余教授認為浸大傳理系給他家庭的感覺，師生之間無所不談，彼此相愛。「人情味濃，很可愛！」余教授微笑道。這師生關係更是發掘研究题目的良方，余教授認為，課堂傳授的知識有限，不少研究題目均在與學生閒談時發現。

莫兆光讚揚余教授觀人入微，並具遠見。他指出，當時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學位嚴重不足，不少具能力的學生也未能上大學。余教授在眾多考生中，能發掘到有實力、具潛質的學生，並加以培訓。莫兆光自豪地說：「後來，大部分電台、電視台、報章均由浸大傳理系畢業生執掌，印証了教授當日的決心是正確。」

對於《新報人》踏入四十年，余教授認為同學除了應付功課，仍能體驗當報人的艱苦，《新報人》更轉為全彩色印刷，已經相當不俗，可改善之處不多。但就整個傳理系而言，則需要建立熱衷研究的風氣。他指出，研究成就是衡量大學指標，余教授從加入浸會學院，便決意建立此風氣，但後來傳播理論停滯不前。「一個學院最重要有一種研究風氣，像北大、清華……」尤其是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引申出很多傳播的問題，傳理人需要為這些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余教授認為學生努力和導師勤奮是相輔相成，並寄望傳理系的學習水平能不斷提升。



何去，何從？ 《新報人》 鄭明仁訓練新聞觸覺 裝備學生

【本報訊】堆滿書籍的《蘋果日報》總編輯室，鄭明仁翻開師弟妹所做的第四十卷《新報人》，「你說，有哪一篇報道能貼近時事？」他認為《新報人》不是大學學生會辦的報紙，而是一份實驗性報紙，「要做，營運模式就要和出面的報紙差不多！」才可以裝備學生。

記者：胡仲邦

編輯：葉孜莉

現職蘋果日報總編輯的鄭明仁，1977年於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後，當了兩年商業電台記者，就轉做文字記者，先後在《成報》及《蘋果日報》工作。不過他說自己當時是「誤打誤撞」地入讀傳理系。「當時入大學試成績不好，於是走到浸會報名。原先是報讀社工系，怎料放榜時，我竟然入了傳理系。」

鄭明仁回憶自己在大專二年級時做《新報人》，困難處處。約受訪者做訪問，要查找《黃頁》、《政府及有關機構電話簿》、「108電話查詢熱線」（現時為1083），或透過兼職報館的師兄，才能知道他們的聯絡方法。

寫好的稿件經校對、植字和排版；而菲林相機所拍的新聞照片，要在黑房沖曬，然後再修剪和排版。排版後還要學生自己開動印刷機自行印製。鄭明仁憶述當時做《新報人》的學生雖然辛苦，但很享受自己的工作。「這時《新報人》的運作，寫稿、拉廣告、印製，都是同學自己一手一腳處理。出版時，同學都有很大的滿足感和成功感。」

鄭明仁表示，由於當時《新報人》的營運模式貼近外面的報紙，他們以後在報館兼職或工作時，很快「上手」。「我們一畢業出來工作時，已經算是半個記者。而行內都會覺得，浸會傳理系出來的畢業生，好使好用。」

獨家新聞被偷 仍感氣憤

三十多年的前線工作，可以令他忘記第一次為《新報人》採訪和報道經歷，但他仍然記得，他當學生記者時，曾採訪一宗獨家新聞後，後來竟被報館兼職的師兄偷去，轉登在報紙頭版。鄭明仁現在仍感氣憤。

1974年，鄭認識一位興建萬宜水庫的工程師。該工程師指出水壩底部漏水。當時全港都未有人知這件事，於是他寫了這篇報道。「怎料後來被一個師兄偷了我的報道，搶先在他工作的報紙頭版刊登出來。我的獨家新聞沒有了，本來應是頭條的新聞，最後只能放在《新報人》內頁！」

他再三強調：「真不服氣！明明是自己的獨家新聞，竟被人偷了去！」

側重專題寫作 時事性不足

鄭明仁作為《新報人》的大師兄，亦為資深的傳媒人，記者亦不忘向他偷師，看看《新報人》有何改善之處。

記：記者 鄭：鄭明仁

記：看過我們的《新報人》後，有甚麼感覺？

鄭：新聞萬變不離其宗，一定要圍繞N(東)、E(南)、W(西)、S(北)四個方向，即是要緊貼本地社會發生的事情來報道。可以寫 feature (新聞專題)，但不要講太多。當時新聞系創立實驗性報紙《新報人》，目的就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新聞系的學生可以對社會發生的事，進行採訪和報道，訓練他們的新聞觸覺及撰寫新聞報道的能力。不過現時的《新報人》側重 feature writing，放了太多篇幅表達人情冷暖，而且很多新聞故事的素材，以前已經有記者採訪過。

記：若過於貼近社會議題，會否令我們的新聞角度，容易和外面報紙相同？

鄭：我想，同學不用怕撞題目或新聞角度。《新報人》創立的目的是，不是和外面的報紙競爭。假若新聞角度最後真的一樣，同學寫好報道後，也可以與外面的報道，互相比

較和參考。這有助訓練他們的文筆。

推廣不足 吸引力不高

記：浸會畢業後，你還有看過《新報人》嗎？

鄭：沒有了，《新報人》在七十年代，曾經每隔一星期發行一次，而且對象是全港市民，令《新報人》的認知度較高。不過到現在，外間對《新報人》的知名度已經大為減少。

中大每期《大學線》出版後，都會發新聞稿給報館或在報館工作的師兄師姐。該期有甚麼「正」或獨家新聞，同事都會第一時間知道，可以盡快轉載他們的報道。《新報人》可以參考《大學線》的做法，加強對外宣傳，令《新報人》有更多機會曝光，提高它的知名度。做新聞報道的同學會有更大的滿足感，他們就會更盡心地做好每一篇新聞報道。

記：那麼《新報人》應該如何提高它的認知度？

鄭：現今這一代年輕讀者是「電視機世代」，要他們對著一大片字海，他們一定會看不慣！《新報人》要有更多及更豐富的圖像，例如設計圖片或漫畫等，令報紙有更多的趣味。同學可以嘗試用更多圖像來表達新聞事件的大概內容，或繪製一些諷刺時弊的漫畫來美化版面。

廣告也有用處，你們也可以和TYA(公關及廣告學生工作坊)合作。那些廣告可以在刊物尺寸上著手，也可以嘗試向公司優惠。廣告的多寡，可以令編採同學想想怎樣包裝新聞，令新聞更具可讀性；而修讀公關廣告的同學可以嘗試拉廣告客戶。《新報人》要進步，營運模式就要和外面的報紙差不多！學生得到足夠的訓練，將來在報館工作，能夠盡快「上手」。編採同學以及修讀公關廣告的同學有更多學習機會，必須想辦法令讀者看這份刊物，從而定出《新報人》的特色和市場策略。

提高互動性 無需孤芳自賞

記：《新報人》也有網絡版，我們應該如何加以利用？

鄭：網絡版《新報人》可以開一個討論區，讓校內同學或其他網民有機會對《新報人》的報道，留下感想或提出意見，從而知道外面的人，怎樣評價這段新聞。編輯部能夠從這些評價中，作出反思和改善，無需要孤芳自賞。

記：如果開放討論區，會否較容易遭網民惡意攻擊？

鄭：《新報人》只屬大學生做的報紙，對社會的影響性不高。即使設立討論區，讓所有網民評價和留言，他們針對《新報人》，使用帶有人身攻擊，或含有誹謗性語言的機會並不高，編輯容易監控討論區的內容。而且，編輯也可以選擇不公開討論區，其他人可以提出意見，但只供內部閱讀和反思。

杜耀明：故題雷同 難有突破

《新報人》的顧問老師杜耀明則認為，《新報人》內的新聞故事，都是由學生自行發掘、採訪和報道，目的是培養學生發掘新聞題材的能力。假如兩者新聞題目相似，學生報紙會有所顧忌。「始終其他大學生都會評價《新報人》。若《新報人》有很多題目，和出面報紙過於相似，它的評價便不會高。」

不過杜指出，《新報人》可以嘗試模仿過去的運作模式，與公關及廣告的學生工作坊The Young Agency (TYA)合作。他認為《新報人》有空間，可以讓兩個組織分工合作。但他強調，負責編採的同學應盡量避免身兼兩職，以免構成利益衝突，「例如有些高等院校在刊物中，刊登研究生課程的廣告。如果記者希望做一些有關高等院校的新聞，就容易受廣告商的壓力。」

想當年

莫兆光（1973至1974年度《新報人》總編輯） 現任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處總經理 承先啟後 薪火相傳

我在一九七零年入讀傳理系，同年第一份《新報人》問世。七三至七四年度我們（四年級）連續出版了十八期，內容涵蓋軟硬新聞、評論、特寫，圖文兼顧，並包容了收費廣告。

當年《新報人》能達致這樣的水平，要感謝三位恩師。

掌舵人余也魯教授對訓練專業報人的執著，足為典範。我清楚記得他第一課便勉勵同學，要謹記當年（一九二六年）上海大公報的四大編採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言。金石明訓，誠為新聞出版的核心價值。

過去廿多年享譽香港新聞界，人稱傳媒教父的黃應士老師，當年為傳理系作了無償付出。他放棄了如日中天的編採工作，全職投入教務，以確保同學獲得最嚴謹專業的編採訓練，更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援，他的一句“*When you get it done, I'll get it printed.*”，使當年《新報人》中、英版共三十六期能夠按時出版，成一時佳話。

另一位指導我們的是潘一工老師。雖然那時他要應付繁重的編務正職，卻仍盡心投入教授編輯課程，並夙夜匪懈地與我們並肩作戰，《新報人》能每期按時出版，他居功至偉。

在我們懷緬《新報人》出版四十年而繼續前行的同時，希望同學謹記創刊當時各位老師的付出與期望，是要訓練一代又一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貢獻社會，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陳潤芝（1981至1982年度《新報人》副總編輯） 現職有線電視直播新聞台台長 我們都是忌廉

“Do whatever they tell you, even moving chairs and tables!”

八一年夏天，暑假將至，我們這班三年級學生，獲分配實習崗位，馬上就要投入職場。行前，我們尊稱為老爺的系主任張國興，以一貫濃重口音的英語，像教小孩般緊張叮囑，生怕眼前這班壞孩子，搞垮了母校名聲。我們的確不小了，廿多歲，「好命」做得人父母，對老爺的叮囑覺得既親切又可愛，心想，還用你教嗎？

轉瞬近三十載，自己也當上了，整天追著「九十後」愛兒叮囑的長氣阿媽。但仍然牢記老爺對我們的愛心。

作為五十後，當年能考上大學絕非天經地義，十個人只有一個擠得進這度窄門，的確是忌廉之中的忌廉。擠不進的，就唯有自想辦法了。正如盧偉力教授大作《找著·別的》所言，七八年，大部分同學都是帶著考兩大失敗的創痛、錯愕和迷惘加入浸會大家庭。

學科課程緊張不在話下，身為不被政府認可的「大專生」，表示你不會輕易借到政府貸款，大部分人就在多份兼職之中渡過四載。

回頭看看，這種壓力，無疑是催逼我們成長，重責任、重「死線」的訓練。初來時的錯愕傷痛迷惘，已昇華成人生鍛鍊的一部分。

老爺的叮嚀，就是要提醒大家，凡事多走一步，不要計較。

回顧職場近三十載生涯，搬抬搬凳的機會倒真不少，每次做這個動作，心裏就會默唸：「老爺，我又搬凳啦。」每次，老爺抓抓陸軍頭，頑童式的笑容，就像冬日的陽光，照暖心頭。

近期有關「八十後」的討論紛紜，話題太複雜我沒打算展開這個討論，不過希望每一位學弟學妹，珍惜得來不易，能到浸會傳理系學習的寶貴機會。踏入職場也要記住，自己其實仍然是社會的忌廉，幸運的一群，要努力保住這塊大家都冇份打拚的金漆招牌。

高明珠（2001至2002年度《新報人》總編輯） 現職《明報》政治組組長

「你好！我係《新報人》記者……唔好意思唔係《新報》，係《新報人》！」這句開場白，相信不少浸大新聞系的師兄妹都曾經講過。不論是七十後、八十後或九十後，我相信任何一個「新報人」，都不會忘記人生第一次自稱「記者」時，既驚又喜的心情。

由戰戰兢兢到雄心壯志，然後患得患失，掙扎於理想與現實，最後因各種原因無奈離開，是不少傳媒人的寫照。就像十個救火的少年，當年的一起奮鬥的「新報人」，不知有多少可以留守到最後。每當身邊人陸續退出，每當在專業中迷失的時候，回想當初那份既驚又喜的傻勁，就是讓你堅守下來的最大推動力！

傳媒行業難捱，慶幸總有一班抱著理想的年青人，及不怕學生們「冥頑不靈」，仍然悉心教導的良師，這場火，才不會熄滅。

張岳堯（2002-2003年度總編輯） 現職明報資深記者（港聞版）

40歲的新報人，滿載我們這群「新報人」在浸會新聞系成長的時光——每一期的工作，既鍛鍊我們獨當一面，亦讓我們在合作過程，把稜角磨平。當記者的，要學會發掘新聞及能獨立完成採訪寫作；當編輯的，卻要與記者合作，趕在死線前完成工作。

40歲的新報人，更記載了社會變遷。當總編那年，社會發生多件大事，先是SARS病毒爆發，大家帶口罩在電腦房改稿排版。隨後再有七一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廿三條。剛巧那時我們正忙出版當屆最後一期新報人，我與其他編輯商討後，決定臨時把頭版換了，但因時間緊迫，頭版只刊登遊行人潮的相片及起了一個「我們可以說不」的標題，內版則重寫了社論，相信這做法亦開了新報人的先例，但難得老師都很支持。

雖然新報人只是一群大學生的實驗報紙，但一直以監察社會為己任，期望未來的師弟妹可繼續薪火相傳。

彭碧珊（2005至2006年度總編輯） 現職明報記者

記得每期《新報人》出版，捧上手沈甸甸的滿足時刻，記得跟編輯記者討論故題趕死線的緊張時刻，還記得有晚編輯們排版至夜深，老師從辦公室走來問要不要被子和餅乾的時刻……

回想當學生的日子仿如昨天。畢業僅僅3年多，多個傳媒機構構思電子新聞收費，報業力求變革競爭激烈，加上互聯網訊息傳遞迅速，網民隨時比記者更快發掘新聞點子。在這個標榜著「人人做記者」的年代，選修新聞是不是「搵笨」？

與其說《新報人》是當記者的實驗場，倒不如說它是每月從各種課堂理論外加時事話題積累而成的結晶。當中的訪問技巧及思考訓練，即使在其他行業亦同樣受用。人生四十而不惑，但《新報人》踏入四十周年，期望記者編輯們保持好奇疑惑的心，繼續發掘好故事。

張家麒（1995至1996年度《新報人》總編輯） 現任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

相當難以解釋的記憶力：當年做《新報人》記者及編輯時所編採過的故事，我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甚至要翻看證書，才能確認自己是96年的畢業生。可是，我卻很深刻的記得當年一位姓羅的副總編輯，在一次《新報人》的編輯大會上講的一句說話：「你們要好好記著，採訪時不要被那些政府官員嚇怕了。你們是註冊了的報章《新報人》的記者，官員係必須給你所需要的資料，以及回答你們的問題。」

他的說話我記住了。到現在我為人師表，知道學生要出外採訪，卻又欠缺信心的時候，我也照樣搬出他的說話給學生訓勉。到學生真的投身了傳播行業，成為了我也做不到的專業記者，又再回校給他們的師弟妹分享，鼓勵他們向自己的理想努力——我發現了一些記憶，原來可以透過這種接力的方法來保鮮。這就是薪火相傳的道理罷。（最近我有兩位學生，加入了那位羅姓的師兄的公司當記者。如果她們知道了他是我當年的師兄，又會有什麼感受呢？）

四十

蛻變

新報人四十周年特刊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
 新報人四十周年特刊 ■ 二零一零年二月 ■ 非賣品
 地址：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方樹泉大樓十樓
 電話：3411 7461
 傳真：3411 5079
 電郵：sanpoyan@hkbu.edu.hk
 網址：www.hkbu.edu.hk/~sanpoyan/
 督印人：黃煜
 統籌：伍甄琪、黃韻蕾、葉芷華
 美術總監：張傑威